

简述关学弟子在民国时期 捍卫中医的重要作用^{*}

王中文 凯文娟 张玉亮
(陕西中医药大学, 陕西 咸阳 712046)

摘 要:民国时期, 历届政府对待中医基本上都是采取歧视排挤的做法, 加上在文化思潮裹挟下不由分说地否定、反对中医的舆论氛围, 中医陷于被“围剿”、被“窒息”的境地。在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, 以于右任、焦易堂、李鼎铭、黄竹斋为代表的一批关学弟子, 挺身而出, 勇敢地扛起捍卫中医的大旗, 担负起拯救中医的重任, 为中医的生存和赓续而奔走呼号、纵横捭阖、抗争作为。

关键词:关学弟子; 民国时期; 捍卫中医

中图分类号:R-05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2-0571(2020)01-0011-04

DOI:10.13424/j.cnki.mtem.2020.01.002

关学弟子在民国时期为捍卫中医做出了很多努力, 现结合文献梳理其对中医药发展的作用。

1 政府歧视、排挤、压制, 中医面临被“围剿”

民国时期, 从 1912 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到 1949 年国民党政府垮台, 其间虽然经过临时政府、北洋政府、武汉国民政府、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阶段, 但是历届政府, 因为在政治上产生的偏见和歧视, 对待中医基本上都是采取排挤压制的态度和做法。加上同时期, 在“科学”“民主”“反封建”的文化思潮裹挟下, 整个社会弥漫着不由分说地否定、反对中医的舆论氛围。

1.1 教育系统漏列, 中医药不得办学校 1912 年 7 月, 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, 制定新的《壬子癸丑学制》, 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。11 月, 当局又颁布《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》, 其中西医学、西药学各开设数十门课程, 而中医、中药不在其中。1913 年 1 月又颁布大学规程, 将大学分文、理、法、商、工、农、医七类, 而在医学类中只设西医学和西药学两门, 没有中医药方面的规定。虽然辩称是“漏列”, 但政府显然是排除中医药列入学校教育。政府的做法, 自然引起中医药界人士的警觉和谴责, 一些团体和人士联名上书, 以余伯陶、包识生为首, 组

织了“医药救亡请愿团”赴京请愿。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, 国务院只得出面表态, 政府“非有废弃中医之意”, 但在实际执行中仍然坚持拒绝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。

1.2 教育部拒绝, 中医不能进入学系 从 1915 年起, 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了一些中医学校, 但政府不予承认, 一直将其视之为卫生机构, 划归内务部管理。1925 年, 中医药界联合向教育部提出议案, 要求将中医列入学系以求教育合法化。但是, 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人士即上书教育部, 表示反对、抵制; 余云岫更是著文《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》、《请明令禁止旧医学校》等。以秦伯未、陆渊雷等为代表的中医界人士, 愤起著文反驳, 引起双方激烈争论以至于攻击和谩骂。教育部即以此为由, 拒绝了中医进入法定学系的要求。

1.3 文化思潮裹挟, 中医“躺着中枪”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皇帝, 建立了中华民国, 但是“民国代替了满清, 不同的不过是皇帝改了总统、尚书侍郎改为部长而已”。为了真正实现民主、独立、自由, 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(当时称为新式教育)的人士发起了一次“反传统、反孔教、反文言”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。在这场“传统、封建”为众矢之的的运动当中, 在“反传统”、“反封建”和“尚科

^{*} 基金项目: 陕西省社科界 2019 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(2019Z043)

学”的猎猎大旗之下,中医几乎成为集“传统、封建、不科学、不民主”于一身的“罪魁”,受到了一边倒的批判,甚至于无情的挖苦、嘲讽和鄙视。当时的风云人物如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、郭沫若、丁文江等都说过一些“名言警句”,代表着当时知识文化界对待中医的态度和情绪,并广为时人及后人传诵,渲染和强化了歧视、否定中医的舆论氛围。

1.4 卫生委员会通过提案,决定废止中医 1929年2月,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,余云岫提交的《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》、《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》的提案获得通过。会议决议公布,表明政府要废止中医,自然引起全国中医界“炸锅”式抗议。3月17日,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,成立了“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”,组成请愿团前往南京进行请愿,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。在全国各地群情激昂的抗议声中,卫生部只得出面表态“对于行政方针,以中国国情为左右,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”,部长薛笃弼并承诺“我当一天部长,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”。不久,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,撤销一切禁锢中医的法令。但是,这些表态和承诺,只是应付抗议而已,并未改变政府部门对待中医的歧视作为。

1.5 卫生部颁布规则,不许中医设立医院 就在废止中医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,1929年4月16日,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了《管理医院规则》,规定“以治疗为目的,设置病床、收容病人者为医院”。对上海、浙江等地关于中医医院是否注册的请示,卫生部明确答复“医院管理规则系专指医师设立之医院,并不包括中医医院在内”。很明确就是不许中医设立医院。而且卫生部不顾中医界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和抗议,在回答行政院质询时,仍坚称“中医不能称之为医院”。之后,卫生部又下发通令,要求中医医疗机构须改称医室,禁止中医参用西医药物及西医器械。

1.6 行政院百般推拖,阻挠中医立法 经过各界人士奋力争取,作为捍卫中医的标志性机构——中央国医馆,于1931年3月正式成立。但是,以汪精卫、褚民谊把持的行政院,基于政治的需要,极力压制中医。先是打击摧毁中央国医馆行使管理全国中医事业的努力;继而拒绝中医界关于仿照西医条例制定颁布《国医条例》的要求;后来,在国民党中央会议通过决议、立法院已审议通过《中医

条例》后,仍以种种理由和借口,拖延条例颁布。

2 关学弟子奔走呼号,捍卫赓续中医

成长于清朝末年、活跃于民国初期、扛鼎于民国中后期的一批关学弟子,秉承着使命担当、济世爱民、传承守正的关学精神,在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际,不避艰险、挺身而出,利用其地位、影响、人品、人缘和学识、智慧,为中医存续奔走呼吁,为中医发展争取地位,为中医学术进行正名。

2.1 于右任,定海神针,全力支持稳住阵脚 于右任(1879-1964),名伯循,字诱人(谐音“右任”),陕西三原人。清末秀才,曾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,为关学弟子代表。同盟会元老,国民党元老,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元老,曾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长、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长、监察院院长等,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重要决策人物。

1929年3月,于右任(时任监察院长)接见了由上海抵达南京的中医请愿团,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医的立场,他说“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,……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,想把中医消灭,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和尚、道士一样,那怎么办呢?”^[1]之后,他从政治上、舆论上,大力支持焦易堂等筹办中央国医馆;在有关会议、各种场合,赞成、呼吁并积极推动通过《国医条例》;通过疏通关系、筹措资金等方式,支持协助在南京开办中医救护医院;曾在国民党国防会议上,联合陈立夫等元老倡议“设置直辖管理中医药委员会,专门管理及研究中医药事宜”。其间,还利用个人就诊机会宣传中医,利用为各地中医机构、名中医题字、书碑,扩大中医影响。

于右任是在民国政府中支持、捍卫中医态度最坚定、职务地位最高的官员。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、人格魅力、人际人脉,在抵抗“围剿”中医的斗争中,稳阵脚、稳军心,发挥着“定海神针”的作用。

2.2 焦易堂,秦中杰士,冲锋陷阵担任主将 焦易堂(1879-1950),陕西武功人,清末秀才。1910年加入同盟会,响应武昌起义,参加陕西光复和抗击清军的战斗。辛亥革命后当选省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,先后断然拒绝袁世凯、曹錕等人高官厚禄的引诱,致力于“二次革命”,曾只身潜入陕西都督陆建章(袁世凯亲信)署衙投掷炸弹。1916年奉孙中山令入京议政,从此成为孙先生的左膀右臂,参与护法运动、北伐、平叛等。1924年1月出席国民

党一大,10月“北京事变”推翻贿选总统曹锟后,他代表国民军赴广州迎接孙中山北上。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,他是料理后事、扶柩到南京奉安的亲信之一。孙中山曾盛赞焦易堂,称之为“秦中杰士”。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,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,最高法院院长等。

1929年“废止中医案”爆发后,焦易堂扛起捍卫中医的大旗,在与排挤压制中医势力的斗争中冲锋陷阵。主要作为有:

①成立中央国医馆——1930年初筹备,1931年3月正式成立,担任馆长,之后在全国及海外建立分馆,成为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中医机构;

②开展中医研究——组织全国著名专家对中医学术进行整理,并编审教材;

③争取中医管理权——1933年6月联合29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中央政治会议提议“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,以资整理而利民生”,但被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会议否决;

④推动中医立法——从1931年起倡议起草《国医条例》;1932年函呈行政院要求审定,未被采纳;1933年联络组织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提案;再经过努力在法制委员会、立法院会议审议通过;1934、1935年,反复与汪精卫把持的行政院推拖拖延进行斗争,终于在1936年1月公布《中医条例》;

⑤创办中医医院——筹创首都国医院,土地、资金已备但因抗战爆发而搁置;胜利还都,历尽艰辛、周折,医院已经建成却因政府撤退未克举行落成典礼。同时,为因应抗战急需,积极奔走筹措,于1937年8月在南京创办中医救护医院,南京失守后医院随政府迁都移址重庆,为中国军民抗战贡献卓著。

⑥设立中国制药厂——在重庆,为解决抗战药源短缺,提倡中药西制,在自家住宅前辟地创办中国制药厂,研制生产中药,供给前方将士,服务后方民众;

⑦开展中医教育——他设法批准成立了多所中医学校如“上海中国医学院”、“山西国医专科学校”等,还团结全国各省国医界名流,举办中医人员短期培训班5期,培养中医人才数千人。

焦易堂先生在与反对歧视、排挤压制中医的潮流和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,在捍卫争取中医地位、保护发展中医国粹的事业中功勋至伟。

2.3 李鼎铭:开明绅士,红色边区崭新天地 李鼎铭(1881-1947),陕西榆林米脂人,幼读经史,兼学中医,参加绥德府考,取入廪生。曾在绥德、米脂、榆林等地教书育人,也曾开设医馆悬壶济世。民国成立后,曾任职于榆林道尹公署。抗战爆发,拥护共产党,主张团结抗日,参加陕甘宁边区工作,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。曾提出“精兵简政”建议,受到毛泽东称赞。他以精湛医术(曾用中医为毛泽东治好胳膊痛)和开明绅士的影响力(温文尔雅,德高望重),促进了边区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。李鼎铭先生曾与毛泽东探讨过中医和西医的关系问题,指出“中西医各有所长,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”,毛泽东大加赞赏,提出了“中西医结合”的著名观点,对中国解放后的中医政策、中西医并重方针影响巨大。1940年,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,毛泽东强调说“必须团结中医,发挥中医的作用”。1940年,边区成立了国医研究会,其宗旨为“团结与提高边区国医人才,研究国医国药之改造,推广边区医药事业,裨益边区人民健康,使国医科学化,国药能代替西药,以克服抗战时期之困难”。研究会下设有研究室、图书室、门诊部,李鼎铭先生为研究会名誉主席。1945年,边区还成立有中西医药研究会,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,该研究会以“团结与提高边区中西医药人员,实行中西医药长期合作,协助政府推广边区卫生医药事业,为人民服务”^[2]为目的,李鼎铭先生任研究会会长。边区政府还颁布《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》,积极鼓励开展中医药工作,褒奖激励中医药人员,并特别规定“国内外医士药师愿在边区举办国医学校、制药厂及其它有关国医事业者,政府辅助之。”李鼎铭先生就曾以国医研究会名义,组织举办了中医训练班,培训了一批服务抗战事业、服务边区百姓的中医人才。

李鼎铭先生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,在与军阀当道、国民党专政迥然有别的政治环境中,以自己的影响和努力,在中国的西北营造了一片保护中医、重视中医、发展中医的新天地,也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,对待中医的态度、方针、政策确定了方向,奠定了基础。

2.4 景莘农,儒医兼长,政坛医界发挥作用 景莘农(1883-1964),名志伊,富平人。曾就学三原宏道书院,师从大儒刘古愚,博学善思,自修中医。曾就读京师法政学堂和北京协和医学堂,为协和

1906年成立时的第一批学生。宣统元年(1909)陕西霍乱流行,他以中草药救治,使许多人转危为安。1911年回陕,曾从政,也行医。1930年起有十年时间主要从政,曾任西安市政府参事,曾任省政府杨虎城、邵力子、孙蔚如三任主席的秘书,这期间正是汪精卫排挤压制中医最猖獗时候,而三位省主席都是中医的坚定拥护者,陕西成为维护中医、倡行中医的模范,这其中当然有景莘农的影响和努力。1940年代,他在西安挂牌行医,中西医兼用,尤其善用经方,人称“医林圣手”。抗战胜利后,西安成立中医师公会,他被推举为理事长,是陕西中医的代表人物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是西安市中医医院的首任院长,是陕西省中医研究所(今省中医药研究院前身)的创始人之一。

2.5 黄竹斋、张师渠,关中名医,医疗学术大有作为 黄竹斋(1886-1960),长安人,自幼喜好中医,熟读经典。后从师关学硕儒牛兆濂、张果斋,成为一代儒医。1929年,废止中医案引发全国抗议浪潮时,黄竹斋被陕西中医药界公推为赴上海参加“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”的代表(西北唯一),之后又参加了赴南京进行请愿的活动。1931年,中央国医馆成立,黄竹斋接受馆长焦易堂聘请,成为国医馆常务理事兼编审委员。参与了国医馆组织的“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”的拟定、修改和完善工作;1934年,作为编审委员会成员,在审查“国医统一疾病名词草案”、审查“病理学意见书”中,反对依傍西医病名,主张应以中医病名为主,反映中医特点;参加了各地国医教材和国医著作的征集和审编,尝试进行全国中医统一教材编写的努力。1935年,被聘为陕西省国医讲习馆副馆长;1940年,曾拟在西安筹建西京中医专科学校、西安中医救济医院、陕西特效中药制药厂,惜未达成。黄竹斋先生中医学术造诣深厚,被称为中国医学史上以中西会通论六经者第一人;医术、医德誉满西北,人称民国时期陕西中医第一人;同时,他在争取中医地位、捍卫中医权益、继承发扬中医特色方面,其功绩同样可以彪炳史册。

张师渠(1867-1932),清廪庠生,武功人。曾在三原正谊书院,师从关中名儒贺复斋,兼学中医,为当地名医。曾加入同盟会,为武功分会会长;参加光复武功,曾率民团驰援秦陇复汉军抵抗清军反扑。军阀控制陕西后,他以行医为业,并改

装束变姓名,进行反对军阀斗争。1918年,出任靖国军红十字会会长。1929年“废止中医案”爆发,他积极参加抗议请愿活动。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,焦易堂特聘其为理事,但先生不幸因病于1932年去世,其同仁后辈一直缅怀、传诵着他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。

2.6 牛兆濂、张元勋,鸿儒大师,传道授业教育高徒 牛兆濂(1867-1937),字梦周,蓝田人,清末举人,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,清末关中大儒,曾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、三原清麓书院。传说他1912年曾不顾个人安危,西出礼泉,只身赴清军大营,劝退清军退兵;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他与张果斋等儒生通电全国主张抗日并组织兵勇数百人欲奔赴前线,传为美谈;他教授的弟子黄竹斋成为陕西中医翘楚;在兴平书院讲学时,还曾赞许鼓励过岐山学子王锦屏“弃文学医”,并向他推荐医道高人,王锦屏后成享誉关中的名医,人称“八先生”。

张元勋(1863-1955),字果斋,兴平人,清末举人,曾先后受业于贺复斋、刘古愚,曾在山西衡文书院、三原清麓书院、西安大学堂讲学,为清末关学大师。他曾与牛梦周等通电全国抗战,还将与其兄长创立的爱日学舍(书院)改名为宏仁书院。他和牛兆濂一样,认为中医为优秀传统之精粹,他教授的弟子米伯让,医术、医德俱佳,在民国后期誉满三秦,开创“米氏医家”。

民国年间的中医,既承受着思想、文化、舆论界的几乎不容分辩的否定、反对甚至谩骂,更遭受着政治高层粗暴歧视和政府部门的排挤压制,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。正是在这危难时刻,关学学人挺身而出,呼吁、抗议、斗争,为中医争名份;成立机构、推动立法,为中医争地位;组织学术、设立机构、开展教育,为中医谋未来。关学学人在捍卫、赓续中医的斗争中,再一次谱写了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历史华章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李金刚. 于右任的中医情[N]. 中国中医药报, 2019-3-21(8).
- [2]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. 陕西省志·卫生志[M]. 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1996: 132.

(收稿日期: 2019-11-28 编辑: 文颖娟)